

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基金丛书

皮亚杰哲学导论

熊哲宏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哲学思想背景	(8)
一、皮亚杰的个性特征与哲学倾向	9)
二、进化论思潮	(12)
三、理性主义和康德主义	(14)
四、机能主义和实用主义	(18)
五、“历史批判的”科学哲学	(20)
六、杜克海姆的整体论与塔德的个体论	(23)
第二章 建构主义和实在论	(28)
一、建构和建构主义	(28)
二、“实在本身”:作为“极限”的客体	(35)
三、超越“认知摹本论”:认识客体就是改变客体	(43)
四、关系实在论:建构主义的本质特征	(51)
第三章 元哲学	(62)
一、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浪漫的”科学主义	(62)
二、哲学作为“睿智”:价值的协调	(67)
三、哲学不能成为科学的合法“基础”	(74)
四、哲学在什么意义上是“形而上学”?	(78)
第四章 认识论理论	(84)
一、认识论本质上与“科学知识”相联系	(85)
二、认识论是“经验科学”	(88)
三、认识论是关于“有效认识的构成”的研究	(95)
四、怎样使认识论成为科学	(102)

第五章 “方法论的”辩证法	(112)
一、辩证法是科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辩证法	(112)
二、传统辩证法概念的重构	(116)
三、独具特色的新辩证概念	(122)
四、辩证运动的三种类型	(129)
第六章 心理学哲学	(136)
一、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136)
二、意识的基本特征和“意识的把握”	(151)
三、认知无意识与情感无意识	(160)
四、心理学解释是一种因果解释	(165)
第七章 科学哲学	(179)
一、皮亚杰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基本特征	(179)
二、科学进步：“理性合理地进化”	(186)
三、科学变化及其解释：平衡过程	(192)
四、科学合理性：成功合理性和理解合理性的统一	(201)
五、不可通约性与“最大整合法则”	(210)
第八章 皮亚杰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	(229)
一、皮亚杰与逻辑经验主义	(229)
二、皮亚杰与实用主义	(235)
三、皮亚杰与结构主义	(238)
四、皮亚杰与“自然化科学哲学”	(242)
参考文献	(249)
后记	(252)

引　　言

本书的目的是对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发生认识论”(Genetic Epistemology)的哲学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它关注的是发生认识论所提出和探讨的哲学问题,而不拘泥于发生认识论本身的具体科学内容和细节。这样一本书似乎特别值得一写。因为皮亚杰在当代所产生的影响,像弗洛伊德一样,已远远超出了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本身,对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教学论甚至文艺理论等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要真正理解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必须避免两种倾向——这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迄今都存在:一种倾向是,无论是研究皮亚杰的心理学家还是教育学家,大都忽视或不重视甚至不懂得发生认识论的哲学方面。他们往往不是看不到发生认识论的哲学前提,就是把发生认识论当作一般的普通经验心理学理论。例如,“英裔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认为皮亚杰是一个经验主义心理学家,他的理论是一种经验主义理论——为儿童怎样学习提供可检验的预言。”^[1]因而他们热衷于对皮亚杰经验性研究进行某一个别的重复实验,以期驳倒或证实发生认识论。而另一种倾向是,研究皮亚杰的哲学家们却又不去研究或根本不懂得发生认识论的科学方面(特别是心理学内容)。这在中国甚为突出。有些人在他们的哲学论著中,为了迎合哲学教科书某些传统观点的需要,大肆滥用皮亚杰的某些术语如“选择”、“同化”、“建构”等,却又不知其科学上的涵义,更意识不到这些概念与他们所要辩护的某些传统论点是格格不入的。

对于那些不重视发生认识论哲学方面的人，本书试图指出，发生认识论的出发点是哲学上的。首先，从皮亚杰提出问题的方式来看，正如 H·格鲁伯(Gruber)指出的那样：“与多数科学家从他们研究领域的内部问题那里提出问题不同，皮亚杰从一般哲学中提出问题，以致于他那特化的科学产品作为一般哲学先见的‘副产品’出现了。结果，在他对知识的多方面贡献中，最使皮亚杰愉悦的贡献无疑是自己的发生认识论，虽然与流行的观点相反，皮亚杰没有杜撰或发明‘发生认识论’这一术语。”^[2]青年时代的皮亚杰在柏格森哲学的熏陶下，受到哲学这种批判地提出问题（“批判的反思”）的思维方式的启发，发现经验事实和经验性研究与获得哲学的结论是相关的，他才致力于一种以经验科学为基础的发生认识论。因此“皮亚杰的研究纲领形成于生物学、社会学和哲学的原理和假设。与利用现有研究手段和实验环境识别心理发展进程相反，皮亚杰……创造了一个对于证实他所推导的心理发展过程所必需的研究方法，即研究的问题导致了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反之。”^[3]

其次，从发生认识论直接的研究对象来看，它是“认识主体”或“认识论主体”，而不是“心理主体”或“个体主体”。发生认识论不是一种关于个体的人怎样发展的普通经验心理学理论，而是关于一种抽象的、理想的个体即认识主体(epistemic subject)的理论。认识主体对于所有独立于个体差异、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主体都是共同的。认识主体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主体，也不是个体的、主观的自我(它具有错觉、歪曲和非合理性倾向)。认识主体是解除了中心化的、理性的和客观的主体。因此，发生认识论是关于认识主体的发展，不是关于心理学主体的发展。皮亚杰认为，存在着一个发展着的共同普遍的合理性——理想化地存在于所有人中的潜在的科学理性。他的任务就是要制订这种认识论主体发展的蓝图，以取代围绕特殊的人及其个体差异的研究。正是心理学家研究后者，但发生认识论者研究前者。这就是为什么皮亚杰不是一个普通心

理学家而是一个发生认识论者的原因。很显然,这种“认识主体”的概念来自皮亚杰关于知识、心智与实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哲学观点。

鉴于发生认识论的基础或出发点是哲学方面的,而不是任何一种心理学理论或多种心理学理论的综合;它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智慧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不是特定儿童智慧发展的各种特殊形式,因此,作为研究发生认识论的一种方法,似乎就应该“着眼于它的连贯性和哲学上的适当性,而不是它经验上的可检验性。对于一种理论的连贯性、概念的清晰性和哲学的适当性的详细考察,从逻辑上说,应该先于对它进行经验可靠性的检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对经验事实的描述或多或少依赖于由理论本身所提供的对它们的解释。在某些理论中,这种解释性因素可以减到最少,但在皮亚杰的理论中它却是首要的。”^[4]此外,“近年来皮亚杰理论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即试图从(智力发展的)认识论过渡到智力发展的心灵学,或者说,从解释智力发展的一般形式过渡到解释各种特殊形式”。^[5]这一新趋向也表明我们对发生认识论出发点的看法是正确的。

再次,从发生认识论的研究结果来看,它要解答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只是解答的方法和途径不同于传统哲学。初看起来,皮亚杰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哲学家。作为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可以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观察技巧,也用不着从事实验,也不声称要去发现现实世界迄今为止未曾预料的事实。他的工作是通过对观念或信念进行纯规范的、先验的分析,去揭示它们之间逻辑的和概念的联系。皮亚杰显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家。皮亚杰正是极其轻蔑地将这样的哲学家称为“形而上学家”——似乎他们能以先验的方式洞悉世界的“本质”。皮亚杰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实验哲学家”,他的每一哲学结论或观点都是建立在严格经验的、实证的基础上的。例如,尽管皮亚杰对实

际上解决本体论问题持怀疑态度,但他在研究生涯的不同时期,还是从经验上研究了儿童对“实在”的建构或儿童的实在概念。这种对“实在”的经验探讨根本上不同于被皮亚杰称为“先验论”的哲学家,后者似乎认为他们能够直接进入“本质”世界,而且由于他们对于任何专门的科学甚至心理学完全无知,似乎更容易进入这个本质世界。正是在皮亚杰对每一哲学问题进行经验探讨的意义上,“发生认识论本质上乃是一种实验哲学,它企图研究儿童的发展,从而去解答认识论上的问题。”^[6]

对于那些不研究或不懂得发生认识论的科学方面的哲学家们来说,本书试图表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学科性质是科学的,而不是传统的哲学学科,也不是作为传统哲学的一个部门或领域的哲学认识论。发生认识论首先是一门科学并具有“跨专业”特征,这在皮亚杰那里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鲁伯说“至少有三个皮亚杰。有一个严肃理论家的皮亚杰,他把儿童思维转向形式化的逻辑建构。有一个诙谐的经验科学家的皮亚杰,他致使整整一代心理学家以新的方式倾听儿童。有一个怀疑者的皮亚杰,通过感受到他还没有解释新颖性的发生问题而向前推进新的研究,这种研究必定位于任何解释思维增长的理论的中心。”^[7]皮亚杰不仅看到了随着当代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认识论愈益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趋势,而且毕生以“使认识论成为一门与哲学分开、与所有人类科学都有关系的科学”为己任。皮亚杰晚年在总结自己毕生的事业时说:“对我来说,我致力于认识的心理发生的努力仅仅是在两件要事之间的一个中介。这两件要事是:探索生物适应的机制和对生物适应的较高形式——科学思想——的分析。对这两者的认识论解释一直是我的中心目的。……使认识论成为一种实验学科以及理论学科一直是我的目标。”^[8]皮亚杰的这一毕生目标在他的第一本书《儿童的语言与思维》(1923年)中就已开始实施。皮亚杰的老师克拉帕雷德(claparéde)在该书“序言”中就看出了这

一点，他说：“皮亚杰先生是在一切哲学问题方面知识最丰富的人之一。他知道每一个隐讳之处和每一个裂痕，他熟悉旧逻辑和教科书里逻辑的每一个缺陷；他和同事们一起共同希望创造新的逻辑，而且深知认识论上的复杂问题。但是他这样通晓其他领域的知识并没有使他陷入怀疑的玄想，反而使他能够在心理学与哲学之间十分明显地划清一道界限，而坚定地站在心理学一边。他的研究纯粹是科学的。”^[9]

尽管皮亚杰经常讽刺哲学家，甚至否认作为职业的哲学，并宣称科学家能够和必须创造他们自己的哲学，但他并不否认哲学和哲学家的作用。他在某些场合或在某种程度上贬低“哲学”，无非是想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思辨的、先验的、“超科学的”哲学——的面貌。格鲁伯说得好：“他选择认识论的中间立场——围绕这个中间物他组织了他如此多的研究——给了他这样的标准，从这个标准出发，他可以用心理学的工具去探索广泛的哲学上相关的问题。哲学家们总是提供心理学的预先假定——常常是隐含着的。皮亚杰的工作则尽力通过展示它们在儿童中的发生而把它们公开化。确乎可能悖论的是，他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将证明是他把心理学的证据有力地注入哲学讨论中。”^[10]

鉴于发生认识论的科学性质，哲学家们在研究皮亚杰时，不仅要注意发生认识论每一概念的科学内涵，而且要明确它的每一结论是科学（或科学认识论）结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结论。作为科学结论，发生认识论永远保持自身的开放性、可错性。皮亚杰曾谦逊地说过，所谓“皮亚杰的理论”迄今为止并未完成，他自己是“皮亚杰的修正者”中的一员。就中国哲学界来说，应切忌滥用皮亚杰的某些科学术语论证自己的某些传统哲学观点。

在说明了研究发生认识论应避免的两种倾向之后，我们就可以概述一下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了。

第一章（“哲学思想背景”）的问题是，影响皮亚杰哲学思想的

主要理论来源是什么。我们将着重指出，迄今对发生认识论的诸多争议甚至误解，大都源出于其哲学上；而皮亚杰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理性主义和康德主义以及“历史批判的”科学哲学，另外我们述及了进化论、机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社会哲学中的整体论与个体论对皮亚杰的影响。

第二章（“建构主义和实在论”）论述建构主义是发生认识论的实质性内容和贡献。主要问题是：建构主义为什么是一种既不同于经验论又不同于唯理论的新认识论？建构主义是唯心论还是实在论？如果是实在论，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从性质和特征上看）实在论？本章着重指出，建构主义是一种关系实在论，这与量子力学哲学的新近趋向是一致的。

第三章（“元哲学”）表明，皮亚杰对哲学的看法，成了他创立一门以经验科学为基础的、并与哲学分开的“发生认识论”的重要理由之一。将论及如下主要问题：皮亚杰怎样看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作为“睿智”的涵义是什么？哲学为何不能成为科学的合法基础？皮亚杰在什么意义上把哲学当作形而上学呢？

第四章（“认识论理论”）认为皮亚杰提出了西方认识论史上最为系统的、真正意义上的“元认识论”。皮亚杰从中要回答的问题是：认识论为什么是一门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怎样才能使认识论成为科学呢？

第五章（“‘方法论的’辩证法”）论述皮亚杰独特的、具有实证科学性质的辩证法模式。认为皮亚杰辩证法突破了自黑格尔以来传统的辩证法模式，为辩证法的当代发展注入了生机。主要问题将涉及到皮亚杰是如何重构传统辩证法概念并揭示新的辩证运动模式的。

第六章（“心理学哲学”）将集中于皮亚杰的意识论和心理学解释理论。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发生认识论的方法是独特的吗？皮亚杰的心理学解释到底是不是科学的或因果的解释？

第七章(“科学哲学”)花较大篇幅论述发生认识论对当代科学哲学所作出的可能的贡献,着重揭示其独特的历史主义特征。最后一章对皮亚杰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作一简要评价。

诚如皮亚杰所说:“对一种概念或一种理论的真正理解,意味着通过该主体对这种理论的再发明。”^[11]虽然本书揭示了皮亚杰的哲学主题,并试图勾画出皮亚杰的哲学框架,但我们的探讨既说不上达到了对皮亚杰哲学的“真正理解”,更不敢说是一种“再发明”,我们只是期望,我们的观点——按照皮亚杰的“同构论”——与皮亚杰的“本文”结构至少是部分“同构”。

“引言”注释:

- [1] C·阿特金森:《理解皮亚杰》,1983年伦敦英文版,第1页。
- [2] H·格鲁伯等主编:《皮亚杰精华文选》,1977年纽约英文版,第735页。
- [3] A·R·吉尔根:《当代美国心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20页。
- [4] C·阿特金森:《理解皮亚杰》,1983年伦敦英文版,第3页。
- [5] D·皮埃尔—安德烈:《皮亚杰理论近期的若干发展》,载《心理学报》1994年第2期,第161页。
- [6] D·埃尔金德:“编者导言”,载《儿童的心理发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页。
- [7][8] H·格鲁伯等主编:《皮亚杰精华文选》,1977年纽约英文版,第X1页。
- [9] 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文化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7页。
- [10][11] H·格鲁伯等主编:《皮亚杰精华文选》,1977年纽约英文版,第743、第X1页。

第一章 哲学思想背景

虽说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理论渊源或思想背景是多方面的，但就其实质而言却主要在哲学上。皮亚杰本人就明确说过：“我把康德范畴的全部问题加以重新审查、从而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就是发生认识论。”^[1]因此，要想理解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特别是它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和它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不弄清他的哲学思想背景是不可能的。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迄今对皮亚杰理论体系的诸多争议甚至误解，大都源出于皮亚杰的哲学上。例如C·阿特金森颇有见地地指出：“由于皮亚杰对哲学的关心，致使他的认知发展理论被淹没在关于人类知识和心智的哲学理论中。因为皮亚杰的哲学根源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理性主义，他的哲学理论表明在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而他的英裔美国的批评者（包括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没有注意到这种背景，相反，他们的哲学根源在于经验主义或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这表明，皮亚杰和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差别，仅仅从发展心理学方面考虑是不能确定的，他们的差别是在哲学方面。……由于来自不同的哲学传统，他们与皮亚杰在心理学解释和知识的本质问题上，有着根本不同的观点。”^[2]R·基奇纳也指出：皮亚杰的理论倾向“在起源和本质上大部分是19世纪的，不被当代20世纪多数思想家所共有。而且，当代多数美国人的理智背景从根本上不同于欧洲人。由于理智背景上的这种差异，对于读者理解皮亚杰的思想来说常常是困难的。他隐含的如下假定：关于问题是什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解决，适当的解决

是什么,为了解决问题应该使用什么方法等等,的确没有被 20 世纪美国多数读者所共有;因而皮亚杰的理论似乎属于完全不同的时代。”^[3]不论这里所引述的这些观点是否完全正确,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弄清皮亚杰的哲学背景是理解他全部发生认识论的前提条件。

本章将在简要述及皮亚杰个性心理特征和他早期所受哲学影响的基础上,概述他哲学思想背景的五个方面:进化论思潮、理性主义和康德主义、机能主义和实用主义、“历史批判的”科学哲学、杜克海姆的整体论与塔德的个体论。

一、皮亚杰的个性特征与哲学倾向

皮亚杰在接受让—克劳德·布林海尔 (Jean-Claude Bringier) 的采访时说过:“你选择的任何成人——不管是原始人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要从儿童开始,并且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使用他早年创造的工具。”^[4]我们感兴趣的是,皮亚杰在他的早年创造的是什么“工具”,它们又是如何形成他的哲学观念的呢?幸好,作为一名称职的(或彻底的)发生认识论者,皮亚杰向我们出色地描述了他记忆中的童年。皮亚杰在他 1951 年左右写的那份自传中力图对他的著作提供“解释因素”,将自己只限于他生活中的“科学方面”。而且在回顾他早期的著述、特别是他的哲学小说《探索》(Recherche, 1918)时,他发现他的“观念”变化极小。更准确地说,他意识到他一直只有一个“单一的个人观念”(Single personal idea);“智慧的运算是按整体结构进行的,这些结构标志着作为整体的进化所努力追求的种种平衡。它们的根基从其机体的、心理的、社会的属性一直延伸到生物形态发生本身。”^[5]的确,皮亚杰这

—“个人观念”支配了他的一生。

皮亚杰在开始对其著作进行自传性解释时，先非常详尽地描述了他的父母。在他 1951 年左右写自传时，他的父亲仍然在世。皮亚杰写道：他的父亲，一位中世纪历史学家，“是一个不辞辛劳、富有批判性头脑的人，他讨厌临时匆忙凑合的概括……他给我讲授系统性研究的价值，甚至在小事上也是这样。我母亲非常聪颖、精力充沛、本质上非常和蔼可亲。然而，她那相当神经质的脾气给我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些麻烦。这种境遇的直接结果之一是，我很早就为了严肃的工作而放弃游戏。显然，我这样做既是模仿我的父亲，也是在一个只属于我的、非虚构的世界里寻求避难。的确，我一直憎恶脱离现实——这种态度与我早期生活的第二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我母亲的精神病有关。正是这一不安因素，使我在一开始研究心理学时就对精神分析和病理心理学问题有着强烈的兴趣。虽然这种兴趣帮助我取得了独立性并拓展了我的文化背景，但我决没有想在那个特殊领域涉足更深，总是更宁愿研究常态心理和智慧的运算，而不研究无意识的种种秘诀。”^[6]

皮亚杰

皮亚杰还对他父母作了一些重要对比。他父亲是理性的，而他母亲则是非理性的；他父亲拘泥于证据，而他母亲则沉溺于“想象性的沉思”。应该说，这种对立的个性也长期出现在皮亚杰本人身上，并长期处于相互冲突之中。“和弗洛伊德一样，皮亚杰也总是意识到他沉思的方面与科学的方面之间的争斗、较量。”^[7]在自传中他解释说，在他大约 18 岁、正准备学士学位论文并继续自己在软体动物方面的生物学研究的同时，他私下精读哲学（特别是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宗教方面的著作是怎样开始影响他的心理安宁。他说他不得不在瓦莱山花一年多时间写一种哲学小说来填补他硬挤出来的空闲时间，他“相当轻率地”于 1918 年出版了这部哲学小说^[8]。皮亚杰承认，当他退居瓦莱山进行写作时，他的“酒神狂欢似的兴奋（Dionysian excitement）才在理智的活跃中得以结

束”。正如皮亚杰告诉我们的那样，他父亲讨厌匆忙凑合的概括，要求用证据检验它们。“皮亚杰毕生从事于科学方法为想象(imagination)服务，就是源于这些早期的样板”^[9]。这一问题皮亚杰在很多场合下都有论述。在《哲学的洞察与错觉》(1965年)中，皮亚杰就谈到他内心感到的“在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证实(verification)的习惯和不断引诱我的沉思的反省(speculative reflection)”二者之间的冲突。他知道沉思“与思想家的整体人格息息相关”，因而易受到“人的无意识愿望”的影响。他承认“公共证实检验法”的必要，而且他作为一个生物学者的早期学徒生涯，给他的内心慢慢灌输了对科学家方法的永久尊重。“然而，正如他的众多批评者坚持认为的那样，皮亚杰的酒神狂欢般的兴奋常使他走火入魔。”^[10]

皮亚杰个性特征的两个方面——科学的和沉思的方面，对于我们理解皮亚杰的哲学至关重要。一方面，他个性的“科学”方面使他崇尚和尊重自然科学，甚至认为科学是认识外部世界的唯一方式，科学的进展就等价于“进步”和“合理性”，不仅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早期的生物学训练使得他对“哲学恶魔”(the demon of philosophy)有了某些防护手段。皮亚杰经常贬低哲学，并称之为“形而上学”，把哲学家称为“形而上学家”。

另一方面，皮亚杰个性的“沉思”方面又致使他重视哲学和哲学问题，认为哲学是“睿智”，它所追求的是“价值的协调”。他并不怀疑哲学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并承认哲学这种“沉思的反省”不断引诱着他。进而由此导致发生认识论的出发点是哲学的，它要解决的是认识成为可能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以及知识从较少有效性向较高有效性的历史发展。的确，正如皮亚杰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个性的沉思和科学两方面总是交织在一起，并存在着冲突、争斗和较量，而这也正好表现在他“浪漫的科学主义”科学观和把哲学当作形而上学的哲学观上。

哲学是形而上学

二、进化论思潮

正如 R·基奇纳所说的那样，“在许多重要的方面，皮亚杰是一个 19 世纪的思想家（即使他出生于 1896 年）”^[11]。众所周知，19 世纪晚期最独特的特征是“进化”的观点。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思想家，如黑格尔、马克思、孔德、斯宾塞、柏格森等，都采用某种类型的进化论观点，这种观点在拉马克、达尔文、华莱士、赫胥黎的进化论生物学中达到了其科学上的顶峰。

从皮亚杰的自传中可以看出，进化论生物学、遗传学、发展生物学对他的思想一直具有关键的影响。皮亚杰说：“我对儿童智力的心理发生进行了实验，至少有 45 年之久。此外，我还研究了两个小问题，一个是关于水生软体动物（椎实螺，Limnaea）的环境适应问题，另一个是关于植物类（景天，Sedum）形态发生的预测问题。在我做这些工作时，始终保持对生物学的浓厚兴趣，就好像我刚刚开始动物学家生涯时所具有的那种激情。”^[12]尤其是，理论生物学中哲学的问题对他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生物学中哲学的、概念的、逻辑的基础问题，像生机论、机械论、目的论和机遇这样的论题，总是为皮亚杰所关注。法国思想家总是对“哲学生物学”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兴趣，皮亚杰也不例外。所有这些思想家共同的信念是：生命是一个进化过程。这种进化过程涉及到按相对固定的法则而进行的发展阶段，例如孔德的宗教、形而上学和科学的三阶段法则、斯宾塞的分化、整合和平衡法则。他们把进化看作是在宏大的宇宙范围内起作用的东西，相信他们的法则适用于这种整体的世界过程。他们相信：实在本身是一个进化发展的有规律过程。而且对这些思想家来说，进化似乎以一种特定的方向而运动——朝向更大

的平衡、适应、自由和无阶级的社会。这种“定向的”的进化过程被认为是进步的范例。柏格森主张，这种进化过程不能机械地而只能参照一种“生命的冲动”——一种连续不断地产生新颖性的创造力——来解释。

关于进化生物学的本质的争论涉及如下一些议题：生机论与唯物论、整体论与元素论、目的论与机械论、发生论与还原论、定向进化与非定向性、遗传与环境、进化中新颖性和创造与预成东西的展开，等等。如果这些议题出现在种族的系统发生范围内，那么它们也出现在个体发生范围内。围绕个体发生发展（既在胚胎学又在心理学）中心的理论的哲学议题，大致上与关于种族的哲学生物学的议题是同样的。同样，提出一种用来回答一个特殊背景中的问题（如生物学）的理论或哲学，也能适用于其它领域（如胚胎学或思想史）。所以，我们看到皮亚杰提出了一种能同时适用于一些这样的领域——进化生物学、胚胎学、心理发生、科学史——的普遍范式，这就不足为奇了。

毫无疑问，皮亚杰的基本哲学倾向是进化论的。如果说在皮亚杰思想中有一个单一主题的话，那就是所有“实在”——生物的、物理的、心理的、智慧的、社会的——以进步的方向进化。这种进化的方向趋于渐进的平衡，这种平衡过程并不归结为偶然或机遇，而是服从于同样的潜在“法则”或解释原则。这样，道德、理性、社会和情感以及科学判断的发展是“同构的”，是平衡过程这一基本的潜在过程的不同方面。可见，这种平衡或自动调节的定向进化原则是一种哲学原则，它构成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和建构的新颖性进步的基础。不仅如此，对发展来说有一种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并不归结为任何非自然的原则。从根本上讲，皮亚杰偏爱进化在本质上是合理的这一信念。

R·基奇纳也指出，皮亚杰的“特殊进化论是对新达尔文主义（以随机性和偶然为基础）和生机论（以非自然主义原则为基础）的

一种替换。在亚里士多德和杜威是自然主义者——生物自然主义者——的同一意义上,皮亚杰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但不是唯物论者或还原论者。而且,皮亚杰的自然主义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生物的和自然的理性主义,不是笛卡尔或柏拉图的理性主义。”^[13]

皮亚杰在他的自传中曾谈到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给予他巨大的理智震动:“上帝与生活的同一本身是一种几乎搅得我入迷的观念,因为它现在能使我在生物学中看到对所有事物和心智本身进行解释。……它使得我决定为对知识的生物学解释贡献我的一生。”^[14]但是对皮亚杰来说,为知识(包括逻辑本身)提供生物学解释就意味着:进化是解释知识的关键。这样,皮亚杰总是执着于生物学的——特别是进化论的——认识论。但这决不是把认识论还原为生物学;恰恰相反,在皮亚杰看来,生物过程具有它自身的合理性。事实上,皮亚杰的一般取向亦可以称为生物学的理性主义。我们将在“心理学哲学”一章更详细地论述这些问题。

三、理性主义和康德主义

虽然皮亚杰常常用“智慧(intelligence)一词,但从哲学或认识论的观点看,他显然所意指的是“理智(intellect)、“理解”(understanding)、“心智”(mind),或总起来说,是指“理性”(reason)。然而,与19世纪的思想家相一致,皮亚杰坚持认为理性不是固定的,而是进化的。他说:“智慧的历史不是一份简单的‘成分一览表’:智慧是一束转换,这些转换同文化的转换或象征性功能的转换不能混为一谈,而是远比这后两种转换开始得早,而且产生这后两种转换;如果理性的演化不是没有理由(指“理性”或“合理性”——引者按)的,而是由于在逐渐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中不得不具有的内在